



[清华启迪创新译丛]

社会创新、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

产业、区域和社会的结构调整过程探索

[芬兰] 蒂莫·J. 海迈莱伊宁
[芬兰] 里斯托·海斯卡拉 编著
清华大学启迪创新研究院 组织编译

社会创新的前沿研究
结构调整典型案例解读
创新决策者必读之作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清华启迪创新译丛]

社会创新、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

产业、区域和社会的结构调整过程探索

[芬兰] 蒂莫·J. 海迈莱伊宁
[芬兰] 里斯托·海斯卡拉 编著
清华大学启迪创新研究院 组织编译

社会创新的前沿研究
结构调整**典型案例**解读
创新决策者**必读之作**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Translation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Social Innova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s: Making Sense of 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cesses in Industrial Sectors" by Timo J. Hamalainen & Risto Heiskala.

© Sitra, the Finnish Innovation Fund 2007

All rights Reserved

责任编辑: 段红梅 范红延

责任出版: 卢运霞

执行编辑: 王伟男

封面设计: 张 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社会创新、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产业、区域和社会的结构调整过程探索 / (芬) 海迈莱伊宁 (Hamalainen, T. J.), (芬) 海斯卡拉 (Heiskala, R.) 编著; 清华大学启迪创新研究院组织编译.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1. 9

书名原文: Social Innova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ISBN 978 - 7 - 5130 - 0813 - 6

I ①社… II. ①海…②海…③清… III ①社会制度 - 变迁 - 影响 - 经济绩效: 文集②经济制度 - 变迁 - 影响 - 经济绩效 - 文集 IV. ①F014. 9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92173 号

社会创新、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产业、区域和社会的结构调整过程探索

[芬兰] 蒂莫·J 海迈莱伊宁

编著

[芬兰] 里斯托 海斯卡拉

清华大学启迪创新研究院 组织编译

出版发行: 知识产权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 1 号

网 址: <http://www.ipph.com>

发行电话: 010 - 82000860 转 8101/8102。

责编电话: 010 - 82000860 转 8119

印 刷: 北京富生印刷厂

开 本: 720mm × 960mm 1/16

版 次: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字 数: 300 千字

京权图字: 01 - 2011 - 3055

ISBN 978 - 7 - 5130 - 0813 - 6/F · 456 (3727)

邮 编: 100088

邮 箱: bjb@cnipr.com

传 真: 010 - 82000893/82000733

责编邮箱: duanhongmei@cnipr.com

经 销: 新华书店及相关销售网点

印 张: 18 75

印 次: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5.00 元

出版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清华启迪创新译丛》 编辑委员会

顾 问：

华建敏 张玉台 顾秉林 赵凤桐 徐冠华 陈清泰 王大中
吴敬琏 钱颖一 柳传志 李开复

主 任：

徐井宏

副 主 任：

秦 君 张红敏

委 员：

曹 新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博士生导师）

程 萍 （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

段培君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博士生导师）

方竹兰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高 建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高世楫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胡 钰 （科技日报社理论部主任）

胡为雄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博士生导师)

柳卸林 (中国科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苏 竣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王大洲 (中国科学院教授)

王建民 (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肖广岭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肖显静 (中国科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曾国屏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清华启迪创新译丛》总序

清华大学启迪创新研究院

“创新”是当今社会使用最频繁的词汇之一，然而提出“创新”的概念还要追溯到一个世纪前。1912年美籍奥地利人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在其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提出了创新的概念。按照熊彼特的观点和分析，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熊彼特非常重视企业家在创新中的作用。他认为，企业家的职能就是实现创新，引进新组合。

哈佛商学院商学历史系教授托马斯·K·麦克罗对熊彼特赞赏有加。他认为，如果凯恩斯是20世纪最重要的经济学家，那么熊彼特将是21世纪最重要的经济学家。创新经济学之门被开启之后，其研究也日益精致和专门化。在创新研究领域，英美及其他欧洲国家远领先于国内。国外已涌现出一批创新经济学的研究者，例如纳尔逊（Nelson）、罗森博格（Rosenberg）、曼斯菲尔德（Mansfield）、多西（Dosi）、罗斯韦尔（Rothwell）、弗里曼（Freeman）、苏特（Soete）、波维特（Pavitt），等等。值得欣喜的是，国内一些著名大学和研究机构越来越重视创新领域的研究，不少学者及其研究团队已经完成了一批颇有影响的成果。

当前，肆虐的全球金融危机依然存在，能否实现像人类历史演进实践多次证明的那样，每一次危机之后，都伴随着科技的突飞猛进和新兴产业的成功孕育，值得期

序 制度和社会创新

W. 理查德·斯科特 (W. Richard Scott)

再次重申，制度意义重大！经过了数十年的否认、忽视和误解——横跨 20 世纪的数十年间，它先后被冠以行为主义、个人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标签——社会学家再次发现了制度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的关键作用。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人类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历史学家、管理学家、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正在重提制度主义的理论观点。人们再次捧起科斯 (Coase)、康芒斯 (Commons)、涂尔干 (Durkheim)、马克思 (Marx)、韦伯 (Weber) 和凡勃伦 (Veblen) 的著作，重拾并发展了他们的深刻见解。制度的研究方法正在形成，从组、群到组织、组织群、组织域、行业、社会 and 跨国组织等所有分析层面审视社会过程和社会结构。

虽然制度的含义深远，在过去的 20 年间，人们对制度的研究的兴趣和关注点更多地集中在宏观层面。在全球化热潮的推动下，国际贸易和经济相互依存的快速升级广受关注。大家仿佛都在谈论全球化。一些人说，所有人都受困于“失控的世界”当中，被迫坐上一列无人驾驶列车，在自由市场、弱化的国家边界和技术革新的助推下飞速奔驰。的确如此。我们所生活的世界越来越相互依赖，但是我本人及本书的编著者们都认为能够对其加以分析和干预。

正如纪廉 (Guillén) 所提示的 (2001b)，全球化时日已久，在这段漫长岁月里，不断有人试图提出有效的基本概念来解释和指导现代化和全球化过程，而我们刚刚才

加入这些人的行列。此前有影响力的研究方法包括现代化理论 (Rostow, 1960)、依存理论 (Evans, 1979)、世界体系理论 (Wallerstein, 1974)、后工业化理论 (Gershenson, 1962) 和新古典主义理论 (Leff, 1978)。相对于这些早期的理论, 制度主义的研究方法^①具有一些重要的优势:

- 避免了对现代化过程和经济发展的绝对化和单一化视角;
- 鼓励在组织、行业或社会层面对制度种类的具体内容加以认真关注;^②
- 支持对多层次制度过程的复杂互动加以关注;
- 发现正在进行中的全球化不仅导致了结构和活动的趋同, 也推动了多样化和创新。

制度的基本要素

当代制度主义理论或称为新制度主义理论发轫于上世纪七十年代, 代表著作有伯杰 (Berger) 和卢克曼 (Luckmann, 1967)、迪马乔 (DiMaggio) 和鲍威尔 (Powell, 1983)、迈耶 (Meyer) 和斯科特 (Scott, 1983)、莫 (Moe, 1984) 和威廉森 (Williamson, 1985) 等人的论著。从那时起至今, 广泛的实证研究推动了理论的大发展, 令制度主义理论成为社会科学内最具有活力的理论阵地之一。成长和进步显而易见, 但是如何定义制度依然众说纷纭——可参见布尔迪厄 (Bourdieu) 和华康德 (Wacquant, 1992)、坎贝尔 (Campbell, 2004)、霍尔 (Hall) 和索斯吉斯 (Soskice, 2001)、尼 (Nee, 2005)、诺思 (North, 1990, 2005)、奥斯特罗姆 (Ostrom, 1990)、彼得斯 (Peters, 1999) 和皮尔逊 (Pierson, 2004) 等人的著作以窥一斑。所以, 我提出自己对制度的定义也就不足为奇了:

① 当然, 一些前辈的研究确实很重要, 比如韦伯 (1968 年译自 1924 年本), 吉尔茨 (Geertz, 1963), 多尔 (Dore, 1973) 等的研究。

② 近两个世纪前的瑞士历史学家、经济学家西斯蒙第 (Simonde Sismondi, 1837: iv) 认为: “我相信, 人们陷入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 那就是总是希望归纳跟社会科学有关的一切。与之相反, 很有必要来具体的研究人类的情况。人必须从一个具体的时期、具体的国家和具体的职业的角度来清楚地观察人为何物以及制度是如何作用于人类的。”

制度是一种具有高弹性的社会结构，由文化认知、准则和法令规章三个要素组成，并与活动和资源相联系，为社会生活提供稳定性和规则。

很幸运，基于当前的目的，这一概念已经被本书的编者广泛地接受。

我的定义与同类定义在某些领域存在不同：

- 相对于其他定义，更重视文化认知——共同的信念、前提、组织模板和计划。

相对于利益或责任，思想的主要性作为重要的主题贯穿本书各章。

- 强调组织是多层次的结构，强调符号的作用，但是坚持认为制度只在与社会活动、社会关系和物质资源联系起来并由他们反映出来才有意义。

- 强调法令规章、准则和文化认知三种不同要素的存在和关联具有差别：为规则和秩序提供了不同的基础；与不同的社会逻辑相联系；依靠不同的机制；由不同的指标确认；提供合法性的不同内容（参见表 3.1）。

- 认为特定的制度体系对某些要素的依赖程度高于其他，并且（或者）随着时间的推移，要素的重要性也出现变化（参见 Hoffman, 1997）。

- 借用吉登斯（Giddens）“结构化理论”（1979、1984），制度在转移和限制某些结构和行为的同时，也在支持和强化它们。

学者们对有关制度的众多争论源于各自对制度要素的不同关注点。强调法令规章的学者们——主要是经济学家和主张理性选择的政治学家——比较关心研究和设计。法令规章比较形式化、明确化，更容易设计和制定。重点放在明确的法令规章、奖惩机制的管控以及监督的重要性（North, 1990；Williamson, 1975, 1985）。不过，规章和惩罚虽然更容易管控，收效更快，但内容也可能缺乏深度，效果难以持久（Roland, 2004）。行为主体与制度“博弈”的可能性更大，以至于行为按照迈耶（Meyer）和罗恩（Rowan, 1977）所描述的情况，与规章和正规结构脱钩。除非其他要素给予支持，否则依赖法令规章可能导致浅层的一致性和脆弱的稳定性。

重点关注准则的学者们——特别是社会学家和政治学领域的历史制度主义者或规范制度主义者——比较关心社会经济行为的内嵌（embeddedness）（Granovetter, 1985；Peters, 1999, : chap. 2）。行为主体并不被视为理性的权衡者，而是当做极

度关心自己与外人的关系以及自身与义务（即身份）之间关系的社会人。他人的反应强化了行为范式，却被行为主体所内化。很多行为并不对“工具性”（instrumental）逻辑起反应，而是对“适当性”（appropriateness）逻辑起反应（March and Olsen, 1989）。行为主体和特定局势要求之间的非正式关系往往胜过狭义的利己主义或功利主义。

而那些强调文化认知的学者——主要是文化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组织理论学家——关注的则是更深的层次，包括世界本质的大众观念（文化框架）和因果关系（社会逻辑）。这些观念是“文化的”，因为它们为形成个人看法和决定提供了重要的模板。它们提供了“思想的软件”作为我们“理性”选择的基础（Hofstede, 1991）。一些观念和逻辑是外在的、易于从思想上控制——把文化当成“工具箱”（Swidler, 1986），另一些则根深蒂固——把文化当做世界的既定概念（Berger and Luckmann, 1967）。后者必然不会很快改变。^①

制度改革

制度作为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的基本源长久以来都是社会学家的兴趣点，但是，最近数十年间，制度改革的起因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最初，人们假设，要想改变制度，就必须依靠外部力量——不可抗拒的自然力、战争、经济动荡或者科技突破——来打破其内部平衡。这些外部力量当然是存在的。但是，进一步的反思则令大多数学者转而相信，完全依靠或者主要依靠外部力量的想法过于简单：制度改革很大程度上依赖内部力量。下列理论发展指导了这种认识。

首先，吉登斯（1979，1984）有关结构化理论的开创性著作提醒我们，所有的社会结构——包括制度结构——都是由社会行为主体建构起来的^②。社会结构既是社会行为的前提也是社会行为的产物。所有的社会行为发生在既有的社会结构之内，受其

① 关于制度因素更广泛的讨论请参见 Scott（2001），第3~4章。

② 吉登斯（1984：24）把制度定义为“社会生活的更持久的特性……使得社会系统具有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固态性质”。

支持和制约；社会行为或者复制既有的社会结构，或者引起既有社会结构的改变。将新的要素引入既有社会结构的能力被称为“中介”（agency）（DiMaggio, 1988；Emirbayer and Mische, 1998）。所涉及的行为主体或是个体或是集体。组织可以选择很多不同的方式回应制度，不仅仅是顺从，也可以战略性地妥协、操控和公开反对，奥利弗（Oliver）（1991）是最早几个指出这一事实的人。制度力量可以以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如上层体系对下层单位施加一致性。这当中也存在着个体或组织对此进行抵制或挑战的“自下而上”的过程，从而向可利用的要素群引入新的模式和逻辑（Scott, 2001）。制度力量并非单向的、形式固定的，而是互动的双向过程。

其次，制度并非单一的一元化体系。弗里德兰（Friedland）和奥尔福德（Alford）从宏观层面指出（1991：232），制度包括可能互相矛盾的群体，这些群体向个体和组织提供多样性逻辑。个体和组织利用这些矛盾来改变社会的制度关系。例如，与亲属系统相关的观念和行为模式就与那些控制经济活动的观念和行为模式相矛盾。经济逻辑与政治逻辑关注不同的利益或价值。即使在单一的制度体系内——在行业层次或组织场域层次，也可能存在矛盾对立。这是因为：

- 无秩序的存在：长时间对秩序、结构和义务的侵蚀（Zucker, 1988）。
- 一般原则和具体状况的差距，宏观和微观层次之间的鸿沟或者不符（Sjöstrand, 1995）。
- 制度要素——规则、范式、信仰——的错位，例如对某个要素的关注引导着重要的个体和组织（Scott, 2001）。

最后，相比于其他观点，新制度主义更加承认思想在社会生活中所发挥的重要独立作用。著名的经济学家约翰·凯恩斯（John Keynes）也对此表示认可。在《通论》的最后一段，他这样写道：

有一些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想法，不管是正确还是错误，都比普遍人的理解更加有力。而世界的确是由少数人统治的。一些务实主义者认为自己不受任何思想的影响，往往沦为某个已故的经济学家的奴隶。

试图解释或指挥制度变化的人——学者和政策提倡者，一般都重视利益的变更。

虽然思想是利益形成的基础和发展的规范，但思想和利益截然不同。坎贝尔详细说明了思想进入有关社会变革的政治决策过程的各种方式。在这些重要的思想中，就有那些提供了深植于既定前提的假设：广泛共有的行为模式和公众态度，诸如指导并限制选择的国民文化和文化范式。在前台的则是那些被用于为决策正名的文化模式，以及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具体指导原则的项目。执行这项工作的行为主体类型各异，从理论家和专业人士（如政客、竞选策划人）到舆论导向专家等定性专家，从媒体代表和顾问等载体，到代理人，即连接对话不同社会领域的中间方。

人们已经越发认识到，思想从一个领域向另一个领域传播的过程中，并非简单地传播普及，而是经过了编辑和翻译的过程（Czarniawska and Joerges, 1996; Sahlin - Andersson, 1996; Westney, 1987）。斯特朗（Strang）和迈耶研究发现，行为和结构要想普及，就必须进行理论化。“理论化就是指抽象分类的发展和细化以及因果关系链等关系模式的形成。这些条件下，我们认为，现在发生的就是对一些既有行为的完全复制。”

此外，思想传播的机制或者载体范围很广。我已经指出，载体形式各异，可能是符号系统（如那些通过大众媒体传播的思想），可能是理性系统（包括单个行为主体和群体行为主体通过联系和人类活动所进行的互动），可能是习惯（如规程和标准作业流程），可能是人工制品（包括工具和技术）（Scott, 2001, 2003）。我们必须承认，载体并无中立的传播者。正如阿伯内西（Abernethy, 2000）所论证的那样，新思想到底是随着侵略者的刺刀而到来，还是经由游商引入，还是随着传教士的福音传入，存在着明显的区别。

社会创新

本书的编著者们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制度在新思想、新社会结构产生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这一根本性难题。针对这一问题，制度学派基本分成两大阵营，他们之间的分歧自然反映在本书各章之中。一种观点被称为“制度的积极理论”（DiMaggio and Powell, 1991: 5 - 6），或者称为“以行为主体为中心的功能主义理论”（Pierson,

2004: 104), 主要以主张理性选择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的研究成果为基础 (Moe, 1984; Williamson 1981)。这些学者提出了有限理想、功利最大化的行为主体的概念, 但是承认选择和行为在制度环境下发生。重点是制度的规范部分: 制度是一个规则系统, 通过运用制约手段即奖惩制度来限制行为。这个理论认为, 行为主体建立了一个特定的制度, 期待着这一制度将能够服务于那些实施这一制度的人的利益。因此, 意图和权力的问题密切相关。

主张理性选择的制度学派学者已经为众多制度设计提供了解释, 从组织和议会内部的激励和控制机制的构成, 到行业管理政策的制定, 再到国家和国际制度的建设 (Shepsle, 1989; Williamson, 1985; Young, 1986)。这一工作为严谨的推理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并引起了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的关注, 让他们关注制度框架在经济和政治变革当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但是, 其充满疑问的假设也禁不起推敲, 很多都在保罗·皮尔森 (Paul Pierson) 在其对制度设计局限性的深入批判中有所强调。简要地讲, 皮尔森指出:

行为主体可能发挥作用, 具有远见, 但是如此多样的目标令设计者的选择不会轻易地演化出制度性功能。行为主体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不会发生作用。或者, 他们发挥了作用, 但却毫无远见。也许, 最重要的是, 他们实际上有一个能够发挥作用且有远见的目标, 但是主要的制度性效果却是无意识的。最终, 行为主体可能做出理性选择。但是做出选择, 广义社会环境的变化以及 (或者) 行为主体本身特点的变化 (例如他们的选择) 可能明显地恶化行为主体和制度性安排的匹配关系 (2004: 108)。

制度建设的第二个观点——这一观点与我的看法相一致——主要与社会学学者和组织学学者有关系。它强调行为主体理性的局限性, 进而强调制度设计理性的有限性。这个观点较难总结, 因为它更加松散, 更加复杂, 还有些凌乱。它将关注的重点从制度的法令规章层面转向规范层面和文化认知层面。制度的确制约着行为主体和行为, 但是也构成行为主体和行为。制度框架和理念成为建构某种单个行为主体 (资本家、企业家、政治家) 或集体行为主体 (行会、教会和公司) 模式的基石。

存在于法律、社会科学、习俗、语言、认识论以及其他社会文化基础中的制度规

则令行为主体和行为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凑，而非凌乱无章。行为主体在能力范围内尽力活动，行为内容与行为主体本身的社会学定义相一致（Meyer et al., 1987: 22）。

反观“理性的选择”，通常既非理性也非选择，而是执行由行为主体的身份和局势的要求所召唤出的现成脚本——或者是其他脚本的一个选段。

因此，要想理解创新和社会创造的源泉，而非找寻个体的特点，许多研究创业精神的当代学者反而强调语境的重要性。创业精神这个词传达了过多的意图和个性，以至于顽固的社会制度学者们不能接受。但是如果不理解成一种特征，而是作为一套推动变革的行为，那么这个词就能融入我们的话语当中。有必要说，行为主体拥有更大的选择能力和创新能力。制度的母本越复杂，就会出现越多的矛盾对立，行为主体能使用的物质也就越多。制度能够不限制行为主体而是赋予行为主体力量，这就是几种方式之一。

萨奇曼（Suchman）及其同事（2001）指出了与创业相关的三种文化过程：传播、重组和理解。

传播将既有模型引入了新领域。这个过程中，创业精神仅仅意味着在进行新尝试时模仿某一领域的组织结构。重组则更进一步，从既有的标准化部分中创建新的组织。最后，理解是建构性创业精神中最极端的部分，涉及建设全新的文化描述，强调意外的异常状况（2001: 355）。

需要注意的是，前两个过程尽管牵涉新的环境或新的组合，却仅仅是执行既有的模型，而不是创造新的模型。正如迈耶（Meyer）和罗恩所指出的，在当代社会中，社会环境当中遍地都是“搭建组织的材料”，只要花费少许气力，便能将其组装成一个结构。

更加普遍的是，许多学者的经验研究都支持这样一个结论，即“创业精神是集体行为”（Schoonhoven and Romanelli, 2001: 387）。创业精神是由个体组成的团队集体协作创造新的组织，而非个人单打独斗，这些团队一般都在既有的同仁网络中形成。它们对于新的行业或组织性人口的形成往往更加重要。只有集体的努力才能合理创造出必要的规则、规范和文化认知，支撑新的行业或领域（Aldrich and Fiol,

1994)。

众所周知,制度性框架一旦创立就会得以延续。典型模式一旦形成,可能就在同样的框架下迅速发展。这就是被我们称为“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ts)的过程(David, 2000)。不同社会的发展条件和发展速度不同,因此,每个社会或多或少都呈现出不同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的母本构成了“国家创新能力”(Murmann and Tushman, 2001: 181; Nelson, 1993)。

当前,有关全球化的长期影响在学者当中引起热议。^①一些人认为全球化将在国家和组织形式(如公司)当中不断趋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断言金融资本所释放出的竞争力将迫使这些机构采取效果最好、效率最高(因此也相似)的制度(Mckenzie and Lee, 1991; Ohmae, 1990)。一些制度学者,例如约翰·迈耶(John Meyer)及其同事已经记录了引导国家和企业的、至少表面上接受相似结构的理性框架的同质化效果(Drori *et al.* 2006; Meyer and Hannan, 1979)。

但是,还有大量学者,包括很多制度学派学者,坚持认为,趋异化——分歧的存在和强化——既是全球化的预料结果也是实际结果。他们指向了国家和社会经济社会结构当中依然存在的基本分歧(Hall and Soskice, 2001),指向了国家政策文化中依然存在分歧(Dobbin, 1994),指向了经济组织的前提以及建构经济系统的不同“配方”(recipe)之间依然存在分歧(Orrù, Biggart and Hamilton, 1997; Whitley, 1992),指向了不同国家和产业面对“相同”的全球化竞争压力所做出的不同战略反应(Guillén, 2001b)。针对全球化如何影响国家和组织的争鸣还远未结束。确实,这些过程本身尚未结束,但是可以这样总结,在国家和行业层面,本书的主要编撰者看到更多的是趋异,而非趋同。

最后一点,虽然本书的核心是发生在国家内部的制度变迁,但是同样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忽视发生在跨国层面的制度建设。在当前这个时代,制度性因子的数量和种类越来越多,它们设定着新的规则、新的规范和新的模式。这些制度性因子的种类包括多国咨询组织、致力于改良和规范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专业组织,从婴幼儿保

^① 对于更深入的总结性讨论,参见 Guillén (2001a) 和 Campbell (2004)。

健到环境保护,再到企业的质量保证,再到国际维权组织,如“维权国际”(Advocacy International)和“地球优先”(Earthfirst)、国际贸易制度的制定者和仲裁者(Boli and Thomas, 1999; Brunsson and Jacobsson, 2000; Smith, 2005; Young, 1986)。这些相关的行为主体和行为过程可能在不同社会中对经济发展发挥着强有力的影响。我们赞同杰利奇(Djelic)和夸克(Quack)所得出的结论:

我们认为,任何类型的经济活动都根植于一个广阔的制度框架当中。从这个观点出发,全球化这个字眼的广义含义的确是跨国市场。因此,我们认为,经济活动的全球化表明……跨国空间中的制度化过程。我们认为,全球化不仅仅是调整改变国家制度,也是在跨国领域进行制度建设,这一领域一般都被描述成一个无序的冲突的领域。(2003: 3)

读者们在研读本书时会发现,在我们的时代,透过制度主义的视角观察和审视的内容实在太多太多。

参考文献

- Abernethy, David B. (2000), *The Dynamics of Global Dominance: European Overseas Empires, 1415 - 1980*,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Aldrich, Howard E. and C. Marlene Fiol (1994), 'Fools rush in? The institutional context of industry construct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 654 - 70.
- Berger, Peter L. and Thomas Luckmann (1967),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New York: Doubleday Anchor.
- Boli, John and George M. Thomas (ed.) (1999), *Constructing World Culture: 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since 1874*,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Bourdieu, Pierre and Loic Wacquant (1992),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Brunsson, Nils and Bengt Jacobsson (eds) (2000), *A World of Standards*,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ampbell, John L. (2004),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Globaliza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Czarniawska, Barbara and B. Joerges (1996), 'Travels of ideas', in Barbara Czarniawska and G. Sevón (eds), *Translating Organizational Change*,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pp. 13 - 48.
- David, Paul (2000), 'Path dependence, its critics, and the quest for historical economics', in P. Garrouste and S. Ioannides (eds), *Evolution and Path Dependence in Economic Ideas: Past and Present*, Cheltenham, UK and Northampton, MA, USA: Edward Elgar.
- DiMaggio, Paul J. (1988), 'Interest and agency in institutional theory', in Lynn G. Zucker (ed.), *Institutional Patterns and Organizations: Culture and Environment*, Cambridge, MA: Ballinger, pp. 3 - 20.
- DiMaggio, Paul J. and Walter W. Powell (1983), 'The iron cage revisited: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and collective rationality in organizational field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8,

147 -60.

- DiMaggio, Paul J. and Walter W. Powell(1991), 'Introduction', in Walter W. Powell and Paul J. DiMaggio(ed),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p. 1 -38.
- Djelic, Marie - Laure and Sigrid Quack(2003), 'Introduction: Governing globalization - bringing institutions back in', in Marie-Laure Djelic and Sigrid Quack(eds), *Globalization and Institutions: Redefining the Rules of the Economic Game*, Cheltenham, UK and Northampton, MA, USA: Edward Elgar, pp. 1 -14.
- Dobbin, Frank(1994), *Forging Industrial Policy: The United States, Britain, and France in the Raihway A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ore, Ronald(1973), *British Factory, Japanese Factory: The Origins of National Diversity in Industrial Relations*,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Drori, Gili S., John W. Meyer and Hokyu Hwang(eds) (2006), *Globalization and Organization: World Society and Organizational Chang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Emirbayer, Mustafa and Ann Mische(1998), 'What is agency? ',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3**, 281 -317.
- Evans, Peter B. (1979), *Dependent Developmen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Friedland, Roger and Robert R. Alford(1991), 'Bringing society back in: Symbols, practices, and institutional contradictions', in Walter W. Powell and Paul J. DiMaggio(eds),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p. 232 -63.
- Geertz, Clifford(1963), *Peddlers and Princes: So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Change in Two Indonesian Tow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Gerschenkron, Alexander(1962),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Giddens, Anthony(1979),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Giddens, Anthony(1984),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Granovetter, Mark (1985),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 481 -510.
- Guillén, Mauro F. (2001 a), 'Is globalization civilizing, destructive or feeble? A critique of five key debates in the social science literatur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7**, 235 -60.
- Guillén, Mauro F. (2001b), *The Limits of Convergence: Globaliz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Change in Argentina, South Korea, and Spai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Hall, Peter A. (1986), *Governing the Economy: The Politics of State Intervention in Britain and Fran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ll, Peter A. and David Soskice(eds) (2001),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offman, Andrew W. (1997), *From Heresy to Dogma: An Institutional History of Corporate Environmentalism*, San Francisco: New Lexington Press.
- Hofstede, Geert(1991), *Cultures and Organizations: Software of the Mind*, New York: McGraw-Hill.
- Keynes, John Maynard(1973[1936]),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London: Macmillan.
- Leff, Nathaniel(1978),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economic group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26**, 661 -75.
- McKenzie, Richard B. and Dwight R. Lee(1991), *Quicksilver Capital*, New York: Free Press.
- March, James G. and Johan P. Olsen(1984),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Organizational factors in political lif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8**, 437 -49.
- March, James G. and Johan P. Olsen(1989), *Rediscovering Institutions: The Organizational Basis of Politics*, New York: Free Press.
- Meyer, John W. and Michael T. Hannan(eds) (1979),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the Worm System: Education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 1950 -197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